

# 墨索里尼

MUSSOLINI

[澳]理查德·博斯沃思 著 李宏强 译

上册



我渴求成为强  
人——一个充满精  
力、充满破坏力、毫  
不犹豫地去惩罚打  
击敌人以贯彻其坚  
强意志的人。

---

贝尼托·墨索里尼  
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



作者简介：

---

**理查德·博斯沃思**

**( R. J. B. BOSWORTH )**

是西澳洲大学历史系的教授，

意大利现代史方面首屈一指的权威。

他是许多大学的客座教授，包括哥伦比亚大学意大利学院、

剑桥大学的卡莱尔大厅学院、牛津大学的贝利奥尔学院，

还在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人类研究中心任客座教授。

## 作者序

朱塞佩·普雷佐利尼在他的战争日记中写道：“澳大利亚人虽然取得了托布鲁克，但他们在世界历史中却并没有什么地位。”于是，1941年1月，他光荣地退居到了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意大利学院。朱塞佩·普雷佐利尼是一个知识分子，是墨索里尼年轻时代的资助人，他在作品里对意大利参加的法西斯战争表示了厌恶。对于任何厚颜无耻地想对意大利的现代历史表示谅解和同情的澳大利亚人来说，他的作品可能是个令人扫兴的东西，更不能说是为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这个在1922年至1945年间的意大利领导人精心打造的作品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也有幸来写意大利历史。并且，从多个方面来讲，我把一生的研究成果都总结在这本新的传记中了。

从我的名字就能看出，我是一个英裔澳大利亚人，天生与意大利就没有多少关系。然而，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开始阅读我父母的藏书，并且从中发现了一本由贝尼托·墨索里尼写的《我的自传》。也许我的父亲（他在1933年至1938年之间在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工作，是一个研究型的化学家，并且在政治上有些模糊地倾向于左翼）是在1935年买的这本书，可能是有感于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给领袖墨索里尼带来的恶名吧。我的父亲后来死于心脏病，当时我还小，还无法与他讨论这些问题。但是我母亲后来回忆说，1935年11月，她曾和父亲到威尼斯度假（尽管意大利当时还遭受着经济制裁，而意大利人对制裁也是愤怒不已，因此当时并不适宜到意大利去旅行）。当他们走在街上的时候，那些不可思议的当地人竟然向我父亲身上吐口水（父亲金发碧眼，一副“英国人”的模样），并且骂他是“英国狗”。母亲也从政治上对这些事情进行了分析。1936年和1937年，他们还曾到纳粹德国度假，母亲对在德国的假期倒是有着很愉快的回忆：那里的啤酒和蛋糕都很好，交通情况也很好。

我们家住在悉尼郊区的上层中产阶级居住区。当我还是一个小孩

子的时候,数以十万计的意大利人就移民来到了澳大利亚,很多年我对他们都不大理解。虽然我从小就对历史有些入迷,但那时并没有什么事情注定要让我以后成为一个研究意大利的历史学家。1961年,我到悉尼大学上学,主修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史。对我激励最大的老师是埃内斯特·布拉姆施泰德,他是为数不多的为逃避纳粹而到澳大利亚来避难的犹太人知识分子之一,著有一本戈培尔的传记。他向我保证将送我到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且哈里·欣斯利将会担任我的导师,而我的研究方向将是20世纪的国际关系。

20世纪60年代是“旧式外交历史”的十年,像许多做研究的学生一样,我一开始也对一战的发生进行了一些研究。由于外交档案一般要保密50年,因此,我们这些博士生们可以看到一些新解密的档案材料,这些零散的档案也许可以显示出1914年(以及其他时间)的战争是如何发生的。欣斯利当时带的学生有将近一个连,分给我的任务是评估英国对意大利的政策。于是我就去了英国公共档案馆,它当时还在伦敦的档案街,并且开始阅读伦敦和罗马之间的外交信函。

欣斯利亲切地给我提出建议说,“文献”有时并不是获取历史知识的起点和终点,虽然我研究的课题是“英国史”而不是“欧洲史”,但是如果能够到罗马待上几个月的话,对我将会大有裨益。于是,1967年9月,凭着年轻时的自信和学得不怎么好的意大利语,我和妻子米卡尔到了罗马。经人引见,我们见到了意大利最有资历的外交历史学家。但是他是重要人物,没有时间来接待像我这样不知名的来访者。但是,他还是安排他的助手朱斯蒂诺·菲利波内·陶莱罗来照顾我们在那里的生活。我们在罗马度过了4个月美好的时光,我也到包括现代历史图书馆在内的许多图书馆查阅了相关资料。我们爱上了罗马,在我们看来,它确实是一个永恒的城市。当然,我查阅的主要是意大利自由党统治时代的相关资料,但我有时也受到吸引,想多了解一些有关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的知识。现在,我很喜欢有关墨索里尼的一些原汁原味的作品,例如他的勤务兵昆蒂诺·诺瓦拉所写的回忆录(尽管内容有很多的可疑之处,并且还是找人代笔写的)。

我的生活遇到了一个转折点。尽管我最终在剑桥所写的论文的题目是《英国对意大利的外交政策,1902~1915》,但我已经决定要研究意大利的历史了。1969年,我作为一个年轻讲师回到了悉尼,并且下定决

心要写意大利的历史。我为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以便在澳大利亚每年的长假期间都到意大利去访问。这个借口就是，当欧洲处在冬季的时候，意大利却是很宜人的季节。另外，在那里可以接触意大利人，那里的档案也是公开的，游客的人数也有限。

从1998年签订合同算起，我写这本传记只用了三年时间。但是，它反映的却是我近30年的研究成果。因此也可以这么说，我欠了许多历史学家、许多档案资料和许多图书馆30年的债。所有这些我已经无法一一提及了，但是有一个情景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那是1970年的12月22日，我第一次到意大利国家中央档案馆。这个档案馆是一座法西斯式的建筑，位于“罗马万国博览会法西斯示范郊区内”（我此前曾去外交部档案馆，位于罗马市的另一边，但同样是一座法西斯式的建筑物。附近还有具有纪念意义的法西斯帝国广场，后来改名为意大利广场）。在意大利国家中央档案馆里，我阅读了许多积满灰尘的有关意大利自由党政府的论文。意大利的档案馆与别国的不同，那里总有人在不停地低声交谈，抽烟的人把室内的空气弄得污浊不堪。突然，里面的学术研究活动停止了，每个人——包括学生、教授、档案保管员和取文件的人——都聚拢到了一张放着好多杯意大利苏打白葡萄酒以及节日糕点的桌子旁。一位男士发表了一个演讲，向所有的人表示祝贺，强调学术工作要发挥集体的优势，并且祝我们圣诞节快乐。后来我才知道，那位男士就是档案馆的馆长科斯坦佐·卡苏奇。在这次小型的庆祝活动中，我很清楚地发现了人性中的博爱精神，我也永远不会放弃对它的希望和期待。

我只在中央档案馆里查了一天的档案，我最喜欢的图书馆是位于拉文纳的奥里亚尼图书馆，那里有很多有关法西斯的相关资料，还有但丁·博洛涅西和所有很友好的工作人员。在那里，我阅读了大量在写这本传记时用到的背景资料。相比之下，位于罗马的意大利国家图书馆却很糟糕。它刚刚经历了开销不菲的技术改造，并且有严格的保密要求，所以多年来在它的入口处就看不到什么书。

在开始写这本书“还债”的时候，我很难一一提及历史学科领域内的那么多同事。人太多了，有的是我在学术上的同事，或者是学生，有的只是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需要保持对学术的一种热情，他们在这方面对我帮助很大。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写了一

些书,这些书也是我原来想写的,因此我非常爱看。他们的思维方法也是我努力学习并渴望自己能够企及的。他们热情友好,在物质、知识和精神上都给了我许多帮助,有些人还热情地就我的写作风格和观点进行了推敲。由于不能列出所有这些人的名字,所以任何一个名单都可能失偏颇。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要特别感谢下列朋友:罗杰·阿布萨隆、洛雷塔·巴尔达萨尔、托尼·巴克、露丝·本吉亚特、朱迪·伯曼、马丁·布林克霍恩、朱迪·博尔顿、埃德蒙·博思沃思、玛丽·博思沃思、弗兰克·布勒茨(已故)、托尼·卡希尔、保罗·科纳、特里莎·克劳福德、詹弗兰科·克雷夏尼、帕特里齐亚·多利亚尼、尼克·杜马尼斯、希拉·菲茨帕特里克、弗朗西斯·弗拉纳根、奥斯卡·加斯帕里、迪克·吉尔里、安东尼·杰尔比诺、格雷厄姆·哈里森、哈维一家、玛丽安娜·希克斯、雷托·霍夫曼、厄尼·琼斯、朱迪思·基恩、大卫·洛温塔尔、菲利普·马登、穆里尔·马奥尼、法比奥·马卢萨、本·梅瑟、米内利一家、乔纳森·莫里斯、彼得·蒙蒂思、迈克尔·翁达吉、路易莎·帕塞里尼、罗斯·佩斯曼、洛伦佐·波利佐托、大卫·里特、吉诺·里佐、基思·罗宾斯、焦万纳·罗塞利、德里克·施罗伊德、恩里科·塞拉、格伦达·斯卢加、埃德·史密斯、乔纳森·施泰伯格、罗布·斯图尔特、卢西亚诺·托西、瓦西姆·格雷厄姆·怀特、沙恩·怀特。

同样,我还欠着许多大学的债——圣约翰大学、卡莱尔大厅学院,剑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牛津大学、位于罗马的英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的意大利学院(在那里的时候,我曾努力地不对普雷佐利尼的灵魂太过无礼)——这些大学都很欢迎我去访问。在澳大利亚,人性的博爱正在遭受一些信奉经济唯理主义的人的破坏。国家研究委员会给我安排了一个舒适的住处,并且准许我两个学期不用授课,于是我利用这段时间来构思和写作这本书。这本书主要是在2000年至2001年的夏季在澳大利亚写的,那是一段特别令人高兴的时光。珀斯的天气总是很晴朗,每天早上一起床,我就径直走向计算机,用古老的研究方法为人们提供信息,带着文学创作的神秘写出篇章,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美妙的事情吗?可能只有等到写另外一本新书的时候才会忘记这种感觉吧。

有些读者可能会为我这种温和的态度感到吃惊,因为我曾在一些场合参加过有关如何解读意大利历史的激烈的学术论战(在地处偏远

的澳大利亚,获取史料方面的知识总是要比获取档案史方面的知识更容易出成果)。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左倾到80年代和90年代的右倾,意大利共和国经历了多次痛苦的转变,而这一过程在2001年5月的时候达到了顶点,右翼领袖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成为了意大利的新总理。所以,在研究意大利历史时不带任何政治立场是不太可能的。直到前几年,有一点才变得非常明显,那就是历史问题,尤其是对墨索里尼、他的法西斯政权及其事业、历程和结局的理解,对于许多意大利人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我还处在天真和单纯的年纪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很长的专论,对意大利1914年以前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批评。之后我发现,意大利最权威的保守派历史学家罗萨里奥·罗密欧在一份报纸上把我痛斥为一个“仇恨意大利的人”。他最好还是去评估一下自己来自“博坦尼海湾”的遗产,而不要参与讨论意大利的自由主义。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结束历史”的时代(不管各种非理性的原教旨主义还有什么样的潜在力量)。源自启蒙运动(它相信人可以通过获取理性知识以及社会行为而实现完全性)的各种意识形态以及它们的后续表现似乎已经彻底失败了,市场规律也是如此。意大利的左派以及一些所谓的“雏菊派”或者“向日葵派”等新的政治集团也在一个“橄榄树联盟”的领导下试图找到“第三条道路”,所以,我也努力地避免让自己过于不合群。这种环境下,在我签订合同和开始写作初稿之间的那段时间里,我也被诊断出了心脏病,而正是同样的疾病夺去了我父亲的生命。但是现在技术发展非常迅速,所以我与其他50多岁的人一样,感觉运气还不错,而不像我父亲那么不幸。我还固守着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理念和理想(并且还可以追溯到1789年),因此我对科技的进步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同时对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也混杂着蔑视和担心,不管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带有一种对立的感觉。

我将让读者自己来决定是否认同这本书中所讲述的事件和态度,或者说让他们确定是否值得认同。我应当承认的一点是,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是试图用“怜悯的眼光”来看待墨索里尼的。我相信读者们将会发现,我是把墨索里尼当成一个恃强凌弱的人、一个怯懦的人和一个人失败的人来写的,并且,虽然写出了这本传记,但我并没有转变成一个领袖或者法西斯主义的崇拜者。墨索里尼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



已经有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想法，但墨索里尼则不同，我也确信，他与其他许多人并没有太多的不同之处。在他那一代人中，除了人性的仁慈之外，他的极度的虚荣和自负、他的令人吃惊的大男子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他犯下的众多疏忽和罪过、他的悲观的达尔文主义是许多人都有的。并且，不管有没有这种仁慈，现在我们很多人也有他的这些思想。

最后感谢两个人——一个是克里斯托弗·惠勒，最机敏和最给人以勇气的编辑；另外一个迈克，她在生活中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给我无限的欢乐，我也要把这本书奉献给她。

# MUSSOLINI 目录

引 言 ..... 1

## 第 1 部·躁动青春

---

**1** 复仇与贝尼托·墨索里尼 ... 15

---

**2** 墨索里尼家族和少年时的贝尼托 ... 43

---

**3** 移民和社会主义者 ... 68

---

**4** 《阶级斗争报》... 94

---

**5** 战争和革命 ... 122

---

## 第**2**部·夺取政权

---

**1** 法西斯最初的几个月 ... 155

---

**2** 法西斯夺权 ... 178

---

**3** 政府 ... 209

---

**4** 强行独裁统治 ... 241

---

**5** 上帝所赐的人 ... 272

---

## 引 言

在 20 世纪上半叶欧洲的政治家中，有哪一位可以让他的国民为他写出这么多的哲学和文学作品，不管其中包含的是批评还是祝贺之词？有哪一位能够在身处重大的危机并且自己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之时还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摆着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作品，并且上面还有他自己所做的评注？谁公开宣布他喜欢树木并且急切地询问他的官员风暴给环境造成了什么样的破坏？谁在当政之后还在席间闲谈中迷恋于探讨知识界的前辈？谁至少在口头上声称他因为他们的专业精神和拒绝迎合潮流的态度而尊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并且敦促他的政党要“容忍这些教授”？哪一位看起来总是非常愿意接受采访，并且在采访中特别喜欢讨论当代的政治和哲学思想？哪一个著有多达 44 卷的个人文集？哪一位曾声称自己从来没有被钱弄脏过手，并且所说的话基本上是真的？谁能在交谈中使用除了自己的母语以外的三种语言？又有谁对自己的女儿非常关切，在女儿结婚和第一次怀孕之后，还经常给身居国外的她写信，并且有时只是讲一讲国家足球队取得的胜利给自己带来快乐？

这些问题可能有些令人感到吃惊，但是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贝尼托·墨索里尼，从 1922 年（或者说 1925 年）到 1945 年（或者说 1943 年），他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领袖，也是意大利的独裁者。以前有关他的英文版的传记以及许多同时代的人都认为，墨索里尼其实是一个既天真又愚蠢的人。正如标准的英国绅士（绅士有时候也会说出一些有点恶毒的话来）安东尼·伊登所说的那样：“我觉得，墨索里尼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强盗，他的话全是胡说八道。”杂乱、吹牛、炫耀性的自负、卑鄙残忍和无能——这些都是与墨索里尼联系最紧密的词语，这些东西反映出的墨索里尼是一个有趣和可笑的人，而不像希特勒等其他的独裁者那样是一个令人恐怖的人。希特勒等人才是可怕的极权主义暴君，而尽管墨索里尼是第一个宣布要建立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

人,但实际上他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恺撒”,充其量不过只是一个小丑而已。

这本新传记的读者可能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然而,当读者们开始阅读此书的时候,你们应当注意,长期以来对领袖墨索里尼的批评性的作品所反映出的不仅仅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还有对“南方人”和“地中海人”的歧视,连我的一些澳大利亚朋友也把意大利人(Italian)称为“Eyetalians”。关于失败、浅薄和罪恶的假设经常出现在有关墨索里尼的英语文献中,好像在意大利以外的国家里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失败一样。墨索里尼通常情况下被评价为“只不过是一个下三烂”,这好像是说,在其他更幸福的、更靠北面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领土上,那些统治者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一直是一流的男人(和女人)一样。

然而在意大利,想要表现这种优越感就不太容易了。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即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意大利的左翼——通过这种或那种的方式都与意大利共产党(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共产党本身在选举中赢得的支持率也在不断地增长)有联系——在自己的身上烙上“抗击法西斯的神话”。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来解读20世纪的历史,意大利在1922年至1945年间的政治是一种恶毒的暴政,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也让绝大多数的意大利人吃尽了苦头,而意大利与最邪恶的纳粹德国的结盟也是很自然并且是不可避免的。同样,意大利卷进二战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和种族主义的大屠杀也是不可避免的。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也最好是用“法西斯主义的模式”来理解了,而这样也将会发现在这两个政权、两个“有感召力的”领导人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这是一个已经被讨论了很多并且还可以继续进行讨论的模式。对于战后的意大利左翼来说,这种对历史的解释方法在现代的政治生活中的用处是最大的。它可以帮助阻击富人的贪婪、男人的大男子主义以及复苏的民族主义的诱惑力。它还可以赋予工人阶级、工会组织、社会人道主义以及相关的组织、机构和理念以特权,而这些正是法西斯主义所反对和努力压制的。

同样,也有很多意大利人不同意左翼的这种世界观,也决不认同对法西斯历史的所有方面都进行谴责。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反反法西斯主义者”及其支持者,如为墨索里

尼写传记的异常固执的作家伦佐·德费利切。早在 50 年代,两个前法西斯分子焦尔焦·皮尼和杜伊利奥·苏斯梅尔就写了 4 卷有关领袖的研究作品,并且对他表现出非常同情的态度(现在对学者们仍然很有用)。德费利切为墨索里尼所作的传记更长,总共 7 本书,加起来超过 6000 页,对墨索里尼的一生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这套书从 1965 年一直出版到 1997 年,最后一本还是作者死后才出版的。用斯大林充满敌视的话来说,德费利切是属于那种“档案老鼠”类型的历史学家。他深入地阅读了大量的政府文件,特别是保存在罗马国家中央档案馆里的文件——这些档案被保存在一座原本用于举办“罗马世界博览会”的建筑物里,而这个展览是为计划在 1942 年庆祝法西斯统治二十周年而建的。因为德费利切明显不像左翼那样对领袖不友好,并且又是兢兢业业地为领袖写传记,所以他对当时留存下来的法西斯分子们具有像磁铁一样的吸引力,他们也因此而把自己保存的资料和日记拿来给他看。完成这些资料研究工作之后,德费利切开始写作出版该套传记了。尽管他的作品冗长而有些纷乱,而且他自己也做了一些编辑加工的工作,但他为后人留下的仍然是一部杰出的遗产,也是后来为墨索里尼写作传记的作家所无法回避和忽视的。

德费利切是墨索里尼的一个解释者,因此我们在读他为墨索里尼所写的传记时需要谨慎小心。特别是在传记的最后几卷书里,他经常设法为领袖进行开脱,也开始轻蔑地认为新闻工作者的一些文章是肤浅的“反法西斯的标准文本”。他还毫不谦虚地声称,他自己得出的是惟一可能的结论。但是他的作品中包含一些引起激烈争论的内容,比如,他强调墨索里尼的政治是“进步的”,还为墨索里尼的坏运气感到遗憾,因为他没有能够说服希特勒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心放在地中海而不是苏联。就在德费利切去世前不久,他这部传记中所反映出的对历史的态度成为意大利当时正在兴起的新的右翼势力可以加以利用的东西。意大利民族联盟中有一些成员自称为“后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对德费利切大加赞扬。民族联盟的前任领导人詹弗兰科·菲尼声称,墨索里尼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民族联盟的现任领导人是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这位亿万富翁在努力做一名政治记者方面要比墨索里尼更胜一筹,他成了政坛上一个带着令人恐怖的“鬼性”的传媒业巨头。在现代意大利,贝卢斯科尼在许多方面都制造了新闻,简直是

太多了。

虽然我远在大洋彼岸，但是与其他大多数的政治事件一样，这些事情也同样让我感到心中不安。我可以无礼地说，对于德·费利切为墨索里尼所作的传记来说，我并不欠它什么债。我的作品中的脚注并没有过多地引用他所写的传记中的细节和资料。在我的研究中，我所采用的更重要的模式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意大利人为墨索里尼写传记时所用的那种模式（更不是这种新的、冗长的“德·费利切”模式）。我对墨索里尼的描述是以我对欧洲历史的理解为基础的。

当克里斯托弗·惠勒友好地建议我可以尝试对墨索里尼进行一个全新的分析时，我有些犹豫。我以前从未写过传记，并且认为（现在还这么认为）自己在更大意义上属于一个“结构派”或者说“功能主义者”历史学家，渴望去探究一些政策的“社会根源”；而不太是一个“意图主义者”历史学家，相信伟大人物确实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伟大的“发电机”。我之所以对这些事情还有一些兴趣，是因为我受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有关纳粹德国的作品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教授 20 世纪欧洲历史的人的养老金都是希特勒给的，至少澳大利亚的情况是这样的。在 35 年的教师生涯里，我在教授欧洲历史时也在课程中偷偷地加入一些意大利的历史，而鉴于纳粹德国的恐怖和神秘，这也是学生们所喜欢的。当我沉浸于有关德国的历史文献中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引起争论的话题很有吸引力，包括希特勒是否是一个“软弱的”独裁者，他的权力是不是也受到了一些限制，他的理论的起源是什么，纳粹这种运动更多地是从“上面”强加的还是从“下面”涌现出来的。因为我还必须讲授苏联的历史（在从希特勒那儿领取养老金的同时也没耽误从斯大林那儿再获得些收益），我也阅读了希拉·菲茨帕特里克等人所写的有关苏联历史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写得很好，同样也写了苏联历史中一些问题，特别是有关在当时复杂并且模糊不清的苏联社会所谓的“极权主义国家”所具有的机能的问题。

因此，我在一开始就注重把墨索里尼放在他当时所处的社会中去进行研究，并且一开始就对“伟人”以及自由主义的理论（也是法西斯的理论）持一种基本的怀疑态度，这种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潜在地拥有实现他或她的意志的自由。我确信（同时，我也告诫自己不要有愚蠢的想成为“伟大的传记作家”的野心），“我的”墨索里尼能够告诉我们许

多有关一个特定个人的罪过,同时,他也会告诉我们许多有关意大利社会(以及意大利人)的情况。

在准备写这本传记之前,我也阅读了一些最近出版的有关20世纪主要的政治家的一些传记。其中有两本传记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一本是保罗·普雷斯顿为弗朗哥将军所写的传记,书中精细地分析了弗朗哥在长期统治西班牙期间是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力的。我借用了他书中的一些主题来与墨索里尼进行了比较,包括普雷斯顿强调的弗朗哥的“高深莫测的实用主义”,他的“避免做出承诺以及……习惯于含糊其辞”。普雷斯顿告诉我,弗朗哥没有忘记使用障眼法,这也让后来的历史学家们非常困惑——“在一生中,他经常改写自己的人生故事。”在他的书中,出现了很多个弗朗哥。(我也问自己,我的作品中需要有多少个墨索里尼才算合适。)同时,至少是根据普雷斯顿的看法,的确存在真正的历史演员。弗朗哥的权力“可以与希特勒的相比,比墨索里尼的权力要大”。普雷斯顿认为,弗朗哥“几乎是在瞬间就能够确定一个人的弱点和/或价值”,凭着这种能力,他才得以掌握国家权力长达40年,并且“技巧完美,他能够狡猾而又敏锐地觉察到人性的弱点,因此能够坚决地打击他所有的敌人,同时又能保持民族主义者联盟的成员对他的忠诚。”不管他对待敌人是多么地残忍,也不管他的世界观是多么地空虚贫乏,但他的确是一个强力的独裁者。按照普雷斯顿的说法,弗朗哥最著名的话是1954年对波旁王室的继承者唐璜所说的:“我永远都不会完全相信任何人。”正是由于这种明智的小心谨慎,对他来说,“西班牙……很容易统治。”细想一下,普雷斯顿得出的结论是,弗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确实有一个(坏的)伟人,这个人快乐而残忍地实践着自己的自由的意志。

我的假设和偏好得到了一些纯化,于是我又开始读伊恩·克肖为希特勒所写的新的极好的传记——有很多个午后,我都把正在写的墨索里尼的传记放在一边,高兴地阅读克肖作品的第二卷(2000年底在澳大利亚才见到)。但是,当我在构思自己的作品时,我最感兴趣的是克肖作品的第一卷中的内容简介。克肖在简介中说,在写希特勒的传记时,他是从一个“错误的”方向出发的。他自己的工作是深入地研究社会历史(我也知道他编写了许多历史文献)。他与许多“结构派”或者“功能主义者”都有联系,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些人都在与那些认为



希特勒是他那个时代最出色的历史演员的“意图主义者”辩论。那些人相信“希特勒的战争”、“希特勒的大屠杀”和“希特勒的革命”，他们甚至认为希特勒是一个“精神变态的上帝”。相反，克肖和他的朋友探究了德国人民和纳粹统治之间的关系，衡量了纳粹在多大程度上赢得了德国人的“一致的意见”。

克肖的知识背景是一方面，另外，希特勒看起来好像没有真正的私生活（除了那些心理学历史学家们猜测的内容以外）。普雷斯顿所写的弗朗哥很幸福地与妻子和女儿一起生活，打高尔夫球，钓鱼，患上帕金森综合症后突然就转向了衰落。但是，如果希特勒有自己的私生活的话，那也更难以进入。克肖哀叹说，“在政治以外，没有什么空间可供元首退却，没有一个与他的公共形象相适合的更深刻的生活方式。”希特勒身上有着明显的矛盾之处，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他在办公室里却是出了名的浮躁和反复无常；但是有些时候，他却又彬彬有礼，具有“艺术气质”，并且喜欢波希米亚人的生活方式。他也许也认为德国很容易统治，也许不这么认为，但是通常情况下，他看起来根本没有为统治德国而感到烦恼。

纳粹德国的权力是集中在元首一个人身上的，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克肖解释说，这种权力“只是部分地源于希特勒自己，它更多的还是一个社会产品——希特勒的追随者们把社会的期望和动机转化成了这种权力并赋予了希特勒。”克肖又说，“因此，希特勒的历史必须是他的权力的历史——为什么他得到了这种权力，这种权力有什么样的特点，他是怎么样使用这种权力的，为什么他被允许扩大了这种权力并打破了各种制度的束缚呢，为什么对这种权力的反抗是那么地软弱无力呢。”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时，克肖得出结论说，韦伯式的有关感召力的理论为其提供了最好的概念上的工具，但是，克肖又警告说，针对希特勒自身的历史性分析必须与德国的社会情况结合起来进行。在克肖看来，维尔纳·威利肯斯说出了可以总结纳粹政权的所有历史的几句箴言。维尔纳·威利肯斯是普鲁士的一个农业方面的官僚专家，他可不像希特勒，在他的办公室里总能找到他。1934年2月，维尔纳·威利肯斯写道：“每个有机会看到的人都知道，就那些元首早晚打算要做的事情而言，元首在自上而下发布命令做这些事情时都会遇到巨大的困难。但是反过来，迄今为止，每个人都在德国的新政权统治下